

教育部“十五”“211工程”辽宁大学“东北边疆与民族”子项目丛书

清代陪都盛京研究

QINGDAISHENGJINGPEIDUYANJIU

丁海斌 时 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清代陪都盛京研究

丁海斌 时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代陪都盛京研究/丁海斌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1

(教育部“十五”“211”工程辽宁大学“东北边疆与民族”子项目丛书)

ISBN 978 - 7 - 5004 - 6025 - 1

I. 清… II. 丁… III. 沈阳市—地方史—研究—清代
IV. K293. 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0218 号

责任编辑 丁玉灵

责任校对 陶璇

封面设计 诚信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传真 010 - 84017153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订 鑫鑫装订厂

版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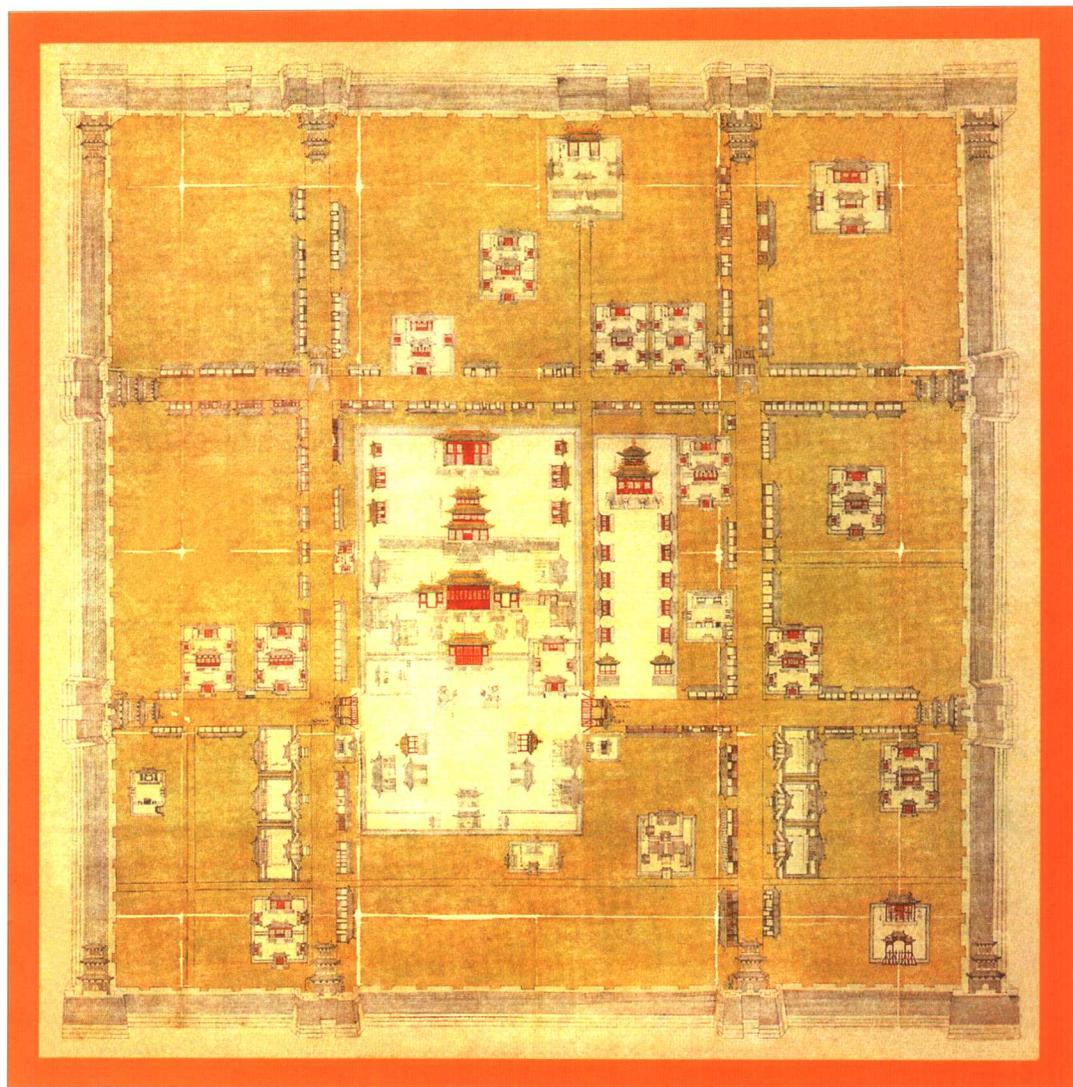
开本 710 × 980 1/16

印张 23.75

插页 2

字数 410 千字

定价 39.00 元



盛京城阙图（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凝炼方向 凝聚队伍 凝结成果

——国家教育部“十五”“211”工程辽宁大学

“东北边疆与民族”子项目丛书总序

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原辽宁大学历史系）由于其历史学科具有较深厚的历史积淀和较雄厚的现实研究实力，在国家教育部“九五”“十五”“211”工程建设过程中，皆被列为重点建设学科。在“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过程中，我们始终思考着这样一些问题：我们的重点学科方向即学术立足点主要在哪里？我们怎样围绕主要学术方向设立项目、组织队伍、开展研究？等等。现在，辽宁大学国家“十五”“211”工程“东北边疆与民族”子项目丛书即将出版了，我们的思考也有了初步的结果。在此，特以此序述其缘由。

中国东北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进程，形成了相对独立和稳定的区域单元，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独特的区域文明。其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地域辽阔。

作为祖国的边疆地区，东北地区陆地与俄罗斯、朝鲜等国接壤，有漫长的边界线；隔海与韩国、日本相望，亦有数千里海疆线。因此，边疆问题是东北历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东北地区的古代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兴起和发展过程中，曾呈现出辉煌灿烂的文明成果。红山文化等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源头之一。

东北又是中国众多民族兴起和发展之地。特别是自10世纪以迄近代，随着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的陆续兴起，继而挺进中原，建立了辽、金、元、清诸王朝，对我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

自近代以来，东北地区亦成为列强争夺的重点地区。在这个阶段，既有张氏父子奉系军阀的统治与列强争夺中的自强，也有东北14年的沦陷史，更有东北人民抵御外来侵略的英雄事迹。

总之，在中国东北这块古老土地上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不仅是东北地方性的事件，更是全国性事件。因此，在这种意义上，研究东北问题就不仅仅是地方性问题，也是全国性课题，甚至是世界性课题。其中，边疆与民族问题，又是其中重中之重的课题。

边疆与民族所涉猎的课题极广，从东北民族的起源，到东北疆域的形成沿革，再到东北区域文化与中华主体文化互动关系的研究；从近代东北地区的开埠到移民，再到东北城市进程以及近代以来东北社会风俗习惯变迁的研究；从跨界民族问题、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原生语言问题，再到东北历史上地方民族政权的民族政策、汉化政策研究以及近代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与掠夺，等等，都可以囊括其中。这些问题不单单是东北地区本身的研究课题，也是中国历史整体发展进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研究课题。

辽宁大学地处东北，占据地缘优势和资料上的便利条件。因此，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许多前辈学者，很早就注意到对有关边疆与民族问题的开发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先后出版了有关东北边疆与民族的研究著作数十种，发表论文数百篇，承担国家及省部级研究项目数十项。其中，在全国产生重大学术影响的有范文澜《中国通史》中的清史卷、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中的清史卷及《清代全史》第9卷、李燕光教授的《东北地方史》及《满族通史》、宁梦辰教授的《东北地方史》、董守义教授主持的《辽河文化丛书》（12卷）、胡玉海教授主持的《奉系军阀全书》（6卷），等等。此外，由我院教师编校出版的《清初史料丛刊》在全国得到普遍认可，在清史研究资料工作上做了开创性工作。李林教授的《满族家谱研究》等，对满族的族源演变进行了实证性的开拓研究；孙文良教授主编的《满族大辞典》，从整体上对满族族源、语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进行了学术界定，奠定了满学研究的基础条件。历史文化学院还曾主办过全国第二届和第七届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在东北近现代史的研究上，孙克复教授、关捷教授等对于甲午战争的研究，张德良教授、陈崇桥教授、周毅教授、胡玉海教授、马尚斌教授等对于奉系军阀及东北军史的研究，皆取得了显著成绩。出版了《明清战争史略》、《中国近代军事史》、《甲午海战史》、《甲午陆战史》、《奉系纵横》、《奉系军事》、《奉系经济》、《奉系教育》、《奉系外交》等著作。由上述学者进行的开拓性研究，为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东北地方史研究领域的更加深入、更加全面的发展奠定了学术基础，并形成了良好的学术传统。

上述所列研究工作，在全国学术界皆有口碑。与上述相对应，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还组建了相应的学术研究机构，并在人才集聚、梯队建设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早在1958年，辽宁大学就已组建了清史研究室；1978年全国史学研究规划会议上，将辽宁大学定为全国清史研究中心、辽金史研究中心；1966年，辽宁大学成立了东北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并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多次承担有关部门课题。在2002年国

家适时启动的“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项目中，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以其实力又获得多项课题立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有关研究成果，对于史学研究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决策参考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通过多年的建设，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已经形成了研究方向稳定且有特色，研究队伍整齐，年龄结构合理，研究经费相对充足，学术地位日渐提高的趋势；业已形成了东北边疆与民族研究、东北社会与民俗文化研究、东北政治与对外关系研究等三大方向，并形成了以任爽、张杰、焦润明、胡玉海、韩世明等 17 名教授、20 名博士为骨干的稳定的研究队伍，为学科建设奠定了学术上和人才上的基础。

就全国而言，学术应有分工。合则成一整体，分则各有特色。应该说，经过数十年凝炼的“东北边疆与民族”研究领域，较好地体现了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东北地方史研究的地域特色和学科优势。同时，在这一领域中，我们充分考虑了与全国特别是东北地区史学同行的分工与合作问题，我们将重点放在具有辽海地区地域特点之红山文化为代表的早期人类文明、唐宋以来的东北史（重点是唐史、辽金史、清前及满族史、奉系与张氏父子研究）等领域。

在以上背景之下，在国家教育部“十五”“211”工程建设中，“东北边疆与民族”被列为辽宁大学重点建设子项目。

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辽宁大学“十五”“211”工程“东北边疆与民族”子项目丛书陆续出版了。愿它们能为中国史学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愿包括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内的中国高等学校历史学科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史学之树常青！

辽宁大学“十五”“211”“东北边疆与民族”

子项目领导小组组长 丁海斌

2004 年 7 月 7 日

遥想陪都（自序）

中国古代陪都问题是我近几年来的一个重要学术研究指向。借教育部“十五”“211工程”辽宁大学“东北边疆与民族”子项目这个平台，我终于可以写出“中国古代陪都系列研究”的第一部著作——清代陪都盛京研究。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悠久的国家。在其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在世界上具有特殊意义、在本国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现象——陪都现象。所谓陪都，即统治者在正式的京城之外，出于某种或某些需要而设立的其他都城。

就世界范围而言，中国之外其他各国也曾有过陪都。如俄罗斯的莫斯科与圣彼得堡（1713年，沙皇一世将俄国首都迁到圣彼得堡，莫、科成为“陪都”）。但陪都在其他各国不能构成一种历史现象，因为它们不是一种经常性、连续性的设置。而在中国古代，由商到清，这种设置连绵不绝，可以称为“陪都现象”。

陪都现象在我国最早出现于殷商时期。^①按照杨宽先生的说法，殷商时期就有了陪都（别都），阼（管）是殷商早期的别都，牧是殷商晚期的别都。^②中国古代比较正规的陪都始于西周：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周武王建立了以镐（今陕西长安县）为京的地域辽阔的大帝国。为了统治辽阔的东方，加强控制中原及周围地区，防止殷贵族叛乱，周王朝开始兴建东都成周洛邑（今河南洛阳），成王时最后建成。洛邑有王城、成都二城，分称

① 也有人提出夏代即有陪都，见张国硕《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但笔者以为确立“夏代即有陪都”的观点证据似乎不足，需要各方面进一步的研究和考古等新的进展来提供更有力的佐证。

②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39页。

东都、下都，它们就是西周的陪都。后来平王东迁，洛邑成为正式的国都。这是中国陪都制度之始。从此，陪都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绵延不绝，直至它的最后一个朝代——清，成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中的一种具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种意义的历史现象。

把陪都作为一种历史上的社会现象加以研究，是一种综合性的研究。陪都，一般首先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与军事现象存在，并常常同时具有巨大的经济与文化意义等。因此，研究陪都问题，学术意义是多方面的——它可以是历史学的分支，也可以是社会学、城市学（中国古都学）的分支。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它具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方面的意义；作为城市学的分支，它与城市学中最活跃的部分——城市历史学、城市社会学、城市文化学等密切相关，是这一领域研究深入发展，特别是中国古都学研究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学术界关于陪都的研究，早已有之。但此前的研究是非独立的，单独将它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尚未有之。

任何一种新学术视角的发掘，都会给我们带来新鲜的感觉与别样的认识。企望本课题的研究，也能给予闻者带来一点新鲜而湿润的气息。

（一）陪都的基本特征

陪都是统治者出于统治与管理国家的需要而设立的正式（主要）都城之外的其他都城。凡是能够成为陪都的城市，一般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1. 地位重要，可与都城并列或仅次

一般来说，设陪都必然有其合理性、必要性，陪都的重要地位也自不待言。《资治通鉴》上唐代名臣褚遂良的一段话特别能说明这一点：“上欲自征高丽，褚遂良上疏，以为：‘天下譬犹一身：两京，心腹也；州县，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①又如：清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载：“惟是陪都重地，根本所关。”^②

2. 有京都之名

陪都必须被称为京或都，正名是必需的。由于性质与具体情况有别，各朝各

^① 《资治通鉴》第十三册，卷第一百九十七，唐纪十三，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下，贞观十八年（644年）二月，乙巳朔，中华书局1956年版，总第六二〇七页。

^② （清）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九，治体二·原治下，筹议奉省全局变通吏治疏，光绪元年，崇实。

代关于陪都的称呼有所不同，叫法很多，如：陪都（京）、留都（京）、别都（京）、下都（京）、行都（京）、东都（京）、西都（京）、南都（京）、北都（京）、中都（京）、上都（京）等等。无论何种称呼，它们都有明确的京都之名。

3. 宫殿、皇城、宗庙、皇陵与宏大的城市建筑

由于是都城，皇帝会不时驾临，所以必须建有具有皇家规制的宫殿。同样原因，陪都的城市建筑也须具有皇家特征，一般来说都有皇城或宫城，外城建设的水平也高于其他城市。中国古代历史上陪都宫殿与城建的规模、形制不尽相同，但它们的这种都城特征都比较明显。

有的陪都，特别是留根型陪都，一般还有皇陵、宗庙，具有“原庙”的性质。如陪都一般都有“王城”之设。如辽中京大定府，有三重方城，即外城、皇城和宫城。所建皇城中设有祖庙和景宗、承天皇后御容；^①再如清代，陈忠倚的《皇朝经世文三编》卷五载：“陪都根本，密迹山陵。”^②

4. 政治特征（组织机构）

一般来说，陪都都有有别于其他城市的组织机构，如陪都内务府、留守处等。甚至有的陪都设有与中央国家机构相类似的国家机构，如明南京陪都设有六部、清代陪都盛京设有五部。这使得陪都可以在必要的时候行使国家职能。

5. 军事特征

由于特殊的地位和政治需要，陪都的驻军力量一般要远远高于其他城市，具有军事重镇的性质。皇帝驾临时更是如此。如战国齐国有五都，其主要军事力量集中于此五都，有“五都之兵”的说法。^③关于陪都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历代统治者都有清醒的认识，如：（清）饶玉成的《皇朝经世文续编》载：“则陪都重地有所凭借，自然固若金汤，不为他人掣肘。”^④

6. 文化特征

既然是陪都，许多方面高人一头，文化也不例外。除以上所讲的宫殿、宗庙、城市建设与文化有关外，陪都一般还会表现出其他文化特征，如重要典籍的收藏、教育之隆重等。我们以清代陪都盛京为例：清代曾实行某些重要典籍的双套制或多套制，如玉牒、实录、四库全书等，这些典籍修订完成后，会择吉日，行隆重的典礼，将其送往陪都盛京。如《黑图档》载：“都虞

① 《辽史·地理志》。

② （清）陈忠倚：《皇朝经世文三编》卷五，学术五·广论中，代上总理衙门书或作上总署王大臣书，叶文铨。

③ 《战国策·燕策一》。

④ （清）饶玉成：《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二十，吏政六·大吏，书张振之师遗事，李元度。

司为移会事：据武英殿修书处称，查本应带往盛京存贮清文吏部则例二部、满洲源流考二部，共一百五十四本，相应知会贵司……即着该员到殿领取，带往盛京，敬谨恭贮。”^①“都虞司为移会事：据武英殿修书处称，为奉旨带往盛京恭贮西汉会要二部、唐会要二部、九家集注、杜诗而补、补后汉年表二部、钦定外藩蒙古会部五公表传满汉各二部、西域同文志二部，知会都虞司速传该处派员领取……”^②

（二）中国古代陪都现象产生与长期存在的原因

陪都现象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普遍性，而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性。也就是说，陪都现象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独具特色的普遍现象。那么，为什么陪都现象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并不具有普遍性，而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却具有绵延不绝的普遍性呢？它必然具有中国历史发展中的独特原因。这个独特原因就在于古代中国与同时期其他国家相比具有“地大物博”（地域广大、社会形态多样）等特点。

1. 地理因素

中国古代陪都现象产生与长期存在的原因首先是古代中国“地大”。古代中国由于特殊的地理状况和农业文明发展的成熟，使其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地域辽阔的特点。在当代世界上，比中国地域更为辽阔的国家，其古代文明都不甚发达，在一两千年前，其地域范围都比中国小得多。可以这样说，从疆域范围来说，古代中国是古代世界中唯一稳定的大国。古代中国地域广大给统治者带来了一个麻烦：古代社会的通讯、交通能力对于管理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是力有所不及的。那么，怎样有效地管理好这个庞大的帝国呢？设立陪都就成为保持国家完整，加强对这个大帝国的控制的有效办法。中国古代的东西两京制大多出于这一原因。

陪都的设立与全国的地理大势有关，这决定了多数陪都设立的大致方位；但同时也与这个城市的地理位置有关，这决定了在大致方位上具体以哪座城市为陪都，或陪都建在哪里。如洛阳之所以多次成为陪都和都城，与它所处的地理形势有关。其北倚邙山，黄河阻隔，南临洛水，伊阙当面，东控虎牢，西扼崤函，四周河山拱戴，中间为开阔的冲积平原，伊、洛、涧、瀍四水纵横其间。洛阳这一优越的自然环境与山川形胜，为历代所重视，因而从商代

① 辽宁省档案馆藏：《黑图档·嘉庆七年京来档》第708号卷，第23页。

② 辽宁省档案馆藏：《黑图档·嘉庆八年京来档》第709号卷，第20页。

开始，后世王朝屡屡建都于此。

2. 民族与经济形态（游牧、农业）因素

其次是“物博”，即具有多种多样的经济区域。虽然中国古代主要是农业国，但原始游牧文明等社会形态仍然存在，这就使古代中国的文明形态具有多样性。这种地域广大、文明形态多样的特点，就决定了古代中国的统治者们常常感到建立一个国都无法满足管理全中国的需要。于是，他们就根据国家管理的需要建立一个或几个陪都，来帮助他们管理全中国。我们以辽五京制为例：

耶律阿保机建契丹国之后，神册三年（918年），辽太祖在潢河畔建立皇都。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改皇都为上京临潢府；把新占领的幽州作为南京幽都府（1012年改名为析津府），也叫燕京；把原南京东平府（辽宁辽阳）改为东京辽阳府。此时的契丹政权有三个统治中心，上京统治草原地区；南京统治十六州之地；东京统治渤海故地。圣宗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又建中京；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年），升大同为西京。从此形成五京并立。

辽代的“五京”，是五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区域的统治中心，更是五个经济中心。这些都城对于一个游牧民族管理国家，繁荣商业交通，发展各族人民之间的贸易，都起了积极作用。

3. 特殊政治因素

有一些陪都的设立是由特殊的政治因素决定的。如西周建下都成周城，是为了将殷贵族聚居于此，便于监视、控制；又如清以盛京为陪都，是因为盛京是清统治者的“根”所在，在政治上有象征意义，同时，便于控制东北广大地区，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在政治因素中，以前朝都城为本朝陪都，如东汉、三国等朝的这一类型较具典型意义。他们的这种做法主要是体现新王朝继承前朝的政治合法性，以迎合国人的正统观念。

4. 其他因素

设立陪都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如帝王祭祀祖先及巡幸需要，陪都常是宗庙所在，常常有祭祀祖先及巡幸的功能。例如清代盛京，康乾等皇帝曾10次东巡祭祖。

（三）中国古代陪都的类型与功能

1. 东西或南北平衡型——两京制陪都

出于管理国家的需要，特别是管理一个大国的需要，在古代社会管理能

力较低下的背景下，设立第二个都城来提高管理国家的能力是一个好办法。在唐以前（包括唐朝），中国国家管理中东西关系的矛盾比较突出，所以在陪都设置上以东西平衡型两京制为主；此后，南北矛盾日益突出出来，所以在陪都设置上以南北平衡型两京制为主。以上两京制陪都是中国古代陪都的主要类型。

两京制始于先秦，并从此成为中国古代陪都现象的主流。先秦陪都的设置，一般是于都城之外只设一处，从而形成先秦时期的两京制。此后，秦，都咸阳，陪都洛阳；西汉，都长安，陪都洛阳；北魏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后，将初都平城作为陪都，称为北京，又称代京；北周建都长安，以洛阳为陪都，称为东京；隋继北周亦都长安，洛阳为陪都，初称东京，后改称东都；唐代仍以长安为都，洛阳为陪都，称东都，后武则天改称神都。唐代曾有三都、五都之设，但屡设屡废，多次恢复两京之制。唐代以后，虽亦有多都现象，但从陪都所具有的在政治、经济或军事方面起辅助作用的角度看（除辽金等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外），大多只是其中之一称得上真正的陪都，实际上仍以两京制为主。

东西平衡型两京制陪都启于先秦，中历秦、汉，直至隋唐等朝。在陪都现象发生的前期，东西两京制是中国古代陪都的主要形式。而且，长安—洛阳常常是这种东西平衡的两个区域中心点。

中国古代早期文明西北较发达，因此以长安为都居多。长安位于关中平原，是中国古代早期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地区，并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因此，从西周建都开始（此前之夏商鲜有长期稳定之都城），此后历经秦、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至隋唐有一千余年。但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在中国成为一个大国之后，东方中原地区成为中国的核心地区。以长安为都的缺点就显现出来：长安远离东方，对全国的控制力薄弱，偏于西北的京师长安对全国来说已是鞭长莫及；而且，随着人口的增加，关中平原有限的粮食适应不了人口增长的需要，尤其是满足不了统治阶级奢侈的生活。关东和南方经济的发展，运往长安的物资和粮食逐渐增多，虽有漕运，但其经过的黄河三门之险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运进的粮食已是“一粒粮食，一粒金”。长安作为都城的地理优越性渐渐失去。因此，要想统治全国单以长安为中心是困难的，在东方建立陪都的想法就自然而然产生了。

都城东移，从历史上看，早在周武王时就已发现其必要性。周都丰镐，距东方较远，为加强对殷人的控制，议定在东方营建新城。洛邑又正处“四方入贡道里均”的位置，有政治、经济、交通上的优越性，便于朝廷对全国

的统治。因此，洛邑被选为新都的地址。西汉都长安，远离东方，控制力薄弱，结果出现八王之乱。隋唐统治范围扩大，唐灭隋后，初期曾毁洛阳宫阙，废东都之称，降为洛阳都督府。太宗贞观四年（630年），又治洛阳宫，高宗显庆二年（657年）以洛阳宫复称东都。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年），改称神都。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称帝，改唐为周，以神都为周都。神龙元年（705年），中宗李显复位，又改称东都。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改称东京。肃宗李亨上元元年（760年）罢东京，第二年又复为东都。从以上几位唐朝皇帝对东都的态度来看，是欲罢不能。东都地位的重要性使其不得不以之为陪都。高宗在位期间曾七次到洛阳，晚年常居洛阳听政。武则天执政的二十余年间，只有两年在长安，其余时间都在洛阳，中宗复位时发动政变也在东都。玄宗开元年间也曾五次到洛阳。

这种东西平衡型两京制陪都，具有多方面的功能与作用：

首先，它使东西连通，建立了统一的王畿。如：西周的陪都成周“制郊甸方六百里，同西土方千里”^①；“初洛邑与宗周通封畿，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覆为千里”^②。

其次，陪都具有国家管理中心（尤其在经济方面）的功能与作用。如成周成为全国征收贡赋的中心，即《史记·周本纪》所说：“四方人贡道里均。”成周不仅是对周围“郊甸”征发人力物力的中心，而且是对四方诸侯征收贡赋的中心，更是对四方被征服的夷戎部族或国家征发人力物力的中心。根据兮甲盘铭文，周宣王命令兮甲（即尹吉甫）“政（征）司成周四方责（积），至于南淮尸（夷）”，规定南淮夷既要贡纳币帛、积贮，还要“进人”（即进贡服役的劳动者），且都必须输送到一定的地点，否则就要受到讨伐。^③

第三，具有重要的军事功能。西周在陪都成周驻屯有“成周八自”，完全出于周朝加强中原以及四方统治上的需要。“成周八自”不仅用于征伐不服从的诸侯和夷戎部落，而且是巩固统治的一种威慑力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一些朝代虽有多个陪都，但由于其中有的陪都是象征意义上的，本质上仍是两京制。如明代，虽然除北京顺天府、南京应天府，还有一个中都凤阳府。但我们仍称之为两京制，因为中都凤阳府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明代的两京制我们可以称之为南北平衡型，因为中国古代后

① 《逸周书·作雒篇》。

② 《汉书·地理志》。

③ 杨宽：《试论西周春秋间的乡遂制度和社会结构》，载《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版。

期,各朝代以南北扩张为主,南北平衡成为陪都设立的主要意义。南北平衡型陪都其表现虽然不如东西平衡型陪都突出,但也应该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还有一种特殊的两京制陪都——实际权力中心型陪都。这是一种较少见的特殊类型的陪都。其典型是东魏下都:北魏大将高欢自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起兵,挟持北魏部分皇室成员北上建立东魏王朝,定都于邺,称上都,又以晋阳为下都。东魏高欢手握重兵,建大丞相府于晋阳,在此发号施令,晋阳成为实际的首都。

2. 分区而治型——多京制陪都

分区而治型多京制一般源于分区管理的需要。发生在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居多,如辽、金。这些王朝一般统治时间相对较短,经济类型不统一,管理经验少,管理能力弱,管理条件(如交通、通讯手段)差,一旦管理范围扩大,就有力所不及的感觉,实行分区而治,可以解决一些管理问题。

分区而治型的多京制陪都以辽金时期的五京最为典型。辽金两国统治者出身游牧民族,他们惯于四处迁移,逐水草而居,对统治一个领土广袤、经济形态多样、行政区域稳定的国度经验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国家划分为五大区域,分设五京,作为区域管理中心。这五大区域的设置,与地理因素、经济因素、民族因素等有关。具体而言,辽前期以上京临潢府(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为首都。由于上京偏在北部,对全国管理不便,所以,他们又以幽州(今北京市)为南京,称燕京,管理经济重心所在的燕云十六州的东部地区;以云州(今山西大同市)为西京,管理燕云十六州的西部地区;以辽阳(今辽宁辽阳市)为东京,管理原渤海国遗民。

多都之设,不止于这种分区而治型,但其他多都之设归属于军镇制陪都、留都制陪都等。如战国时齐国即设有五都。据文献载,齐宣王曾发“五都之兵”以伐燕。^①齐国五都除国都临淄外,其余四都大都是设在齐之四境的军事重镇,主要担负着安全防御的军事职能。它们本质上应属下一陪都类型——军镇制陪都。

3. 国防主导型——军镇制陪都

多数陪都的设立都具有一定的军事意义。但不同的是,许多陪都的军事特征只是陪都诸多特征之一,而且不是主要特征。这里所说的军镇制陪都,则是那种具有突出军事意义的陪都。如:战国时燕的下都、三国时吴国的武昌等。

^① 《水经·浊漳水注》。

战国燕下都具有明显的军事功能。战国中期，秦国、齐国和赵国相继强大起来。而齐、赵两国均为燕国的近邻，他们的强大无疑对燕国构成了威胁。尤其是齐国，威王用驺忌为相，整顿朝政，不长时间就使“齐强天下”^①。特别是经过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大败魏国，齐国更是不可一世。另外，燕国西南所临的中山国，虽为千乘之国，但实力也不可小觑。史载其与燕、赵这两个万乘之国交战，往往屡战屡胜。所以从当时燕国所面临的形势分析，其于南部边陲营建下都，实为防御来自南邻齐、赵、中山之军事威胁。同时，燕国亦借此为据点，与诸国逐鹿中原，争雄天下。

4. 旧都留根型——留都制陪都

古代帝王出于对祖籍或肇兴之地的眷恋与留后路等的需要，以自己的老家或迁都前旧都为陪都。

明代陪都主要有南京与中都。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南京以旧都立为陪都，中都凤阳府因系朱元璋的老家而称为象征意义上的陪都。清代则因盛京为“紫气东来”的龙兴之地，立为陪都。曹魏五都，其陪都皆有留都之意：“魏因汉祚，复都洛阳，以谯为先人本国，许昌为汉之所居，长安为西京之遗迹，邺为王业之本基，故号五都。”^②留都之义，怀旧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留都制陪都主要有以下功能：第一，政治上的所谓“龙兴之地”的象征意义。第二，皇家宗庙或祖陵所在，可供祭祀拜祖之用。如清康熙、乾隆等帝10次东巡盛京祭祖。第三，祖宗根本，以为退路。如清代立盛京为陪都，含有一旦经营中原失败，以为退路之意。第四，其他特殊用途。如明中都、清盛京成为囚禁皇室罪犯之地；再如清盛京成为贮藏皇家玉牒、四库全书等珍籍重宝之地等。

5. 巡幸暂住型——行都制陪都

行都的第一种是帝王经常巡幸、狩猎、消暑之地，虽非标准性意义的陪都，但因皇帝定期莅临，其陪都含义也是非常清楚的，如元代上都、清代承德。它们一般具有完整的宫殿（行宫），有皇帝在那里巡幸、狩猎、消暑、办公、接待宗教领袖、外国使节等功能。

行都的第二种是帝王出于避难的目的暂住而形成的陪都。中国古代奉皇帝为天子，皇帝即国家。因此，皇帝所在，即国都所在。即使是在逃难之时，所在城市也有陪都之尊。如“安史之乱”后，唐玄宗避难逃至的蜀郡（今四

① 《史记·六国年表》。

② 《水经·浊漳水注》。

川成都市)，肃宗到过的凤翔（今陕西凤翔县）。因此，肃宗至德二年（757年）以蜀郡为南京，凤翔为西京，分别作为陪都，而称长安为中京。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迁到重庆，亦称之为陪都。可以说是古代传统之再现。

6. 母子一体型——守望制陪都

这种都城的格局是：以相邻两城为都，一为正都，一为陪都。其功能主要是两相呼应，并具有其他辅助作用。如：西周初，年代约在公元前11世纪至前771年间，以宗周镐京为都城；陪都丰京，号东都。两者一水之隔，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郊沔河两岸，丰在河西，镐在河东，实际上是统一体。两城分别为文王与武王所建：早在周文王之时，为向中原地区拓展，在沔渭间筑设丰京；周武王继位，再建镐京，历时300年。陪都丰京是宗庙和园囿的所在地，镐京为周王居住和理政的中心。其后的东都成周（洛邑）也为双城制（杨宽先生认为是小“城”连大“郭”^①）。即：东都分王城、成周两城，王城为王宫、宗庙所在，成周主要为军队与殷遗民等所在。

（四）中国古代历朝的陪都

夏，都城安邑等。一般认为未见陪都。但有学者认为此时已出现陪都。^②

商，都城殷、阑等。实行陪都制。郑州商城即阑（管）是殷商早期的别都，洹是殷商晚期的别都。^③ 郑州商城为国都时，堰师商城为陪都。^④

西周，周初，都城镐京。陪都丰京，号东都。两者一水之隔，实际上是统一体。周成王时，另在洛邑建东都（陪都）成周。

东周，都王城。陪都成周城，并一度成为正式都城（避乱）。各诸侯国亦有陪都制。如春秋楚国之“三国”——陈、蔡、不羹；战国时齐国之五都——都临淄，陪都平陆、高唐、即墨、莒；战国时燕国都城蓟，陪都为下都武阳等。

秦，都咸阳。陪都洛阳。

西汉，都长安。陪都洛阳。

东汉，东京雒阳（25—190年），西京长安（190—195年）、许（今河南

①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4—54页。

② 张国硕：《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③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34页。

④ 李自智：《先秦陪都初论》，载《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6期；陈旭：《夏商文化论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